

地方知识与自然阶序

华西的植物研究与

人类学（1920~1937年）

李如东 著

Local Knowledge and
Natural Order

Botany and Anthropology
in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1920-193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地方知识与自然阶序

华西的植物研究与

人类学（1920~1937年）

李如东 著

Local Knowledge and
Natural Order

Botany and Anthropology
in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1920-193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方知识与自然阶序：华西的植物研究与人类学：
1920-1937年 / 李如东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18.8

ISBN 978-7-5201-3261-9

I. ①地… II. ①李… III. ①植物学－研究－成都－
1920-1937 ②人类学－研究－成都－1920-1937 IV.
①Q94 ②Q9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85838号

地方知识与自然阶序：华西的植物研究与人类学（1920~1937年）

著 者 / 李如东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杨 阳

责任编辑 / 杨 阳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学出版中心（010）59367159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4 字 数：195千字

版 次 /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3261-9

定 价 / 6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在我认识的年轻学人当中，给我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的，如东是一位。他生长于“西南夷”之地，本学历史学，2009年进入了人类学领域。在一个新的知识领地，他不可能如入无人之境，而是需一番拼搏，以求“翻身”。在这过程中，如东有过一些困惑，受过一些煎熬。从历史学到人类学，从“过去主义”到“当下主义”，从“经验主义”到解释至上，从“文字主义”到“原始主义”，种种跨越，费去了如东大量心神。然而，最终，如东“熬”过了这些，在历史人类学、学科史、区域（中国西北和内亚）社会与文化研究诸学术空间之中，下足功夫，找到了立足点，完成了几项值得称道的研究。

本书呈现的，是他的研究的第一项。研究的核心内容，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华西协合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的植物研究与人类学。

这所英美教会1904年创办于成都华西坝上的大学，是一所在华的西式现代大学。那里，1910年代便有传教士学者从事自然与人文研究。1920年起，在博物学和民族学的学科框架下，此类研究得以在西部（尤其是四川西部）集中开展。从这些研究中，生长出了大量博物学知识。这些博物学知识，多数关涉今日所谓的“民族地区”，由是，时常也兼有民族学的内容。无论是出于偶然还是计划，这些知识从一个别致的角度为人文世界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华西坝上的这件往事，深深吸引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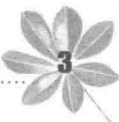
如东在学之时，国外人类学“先进”国家的一些学者们，有的正致力于赋予人类学自然与人文的双重属性，有的正试图开拓全新的人伦—宇宙论视野，以之破除启蒙以来支配思想和科学的自然—文化、物质—精神、客观—主观二元对立主义。在缺乏“天人合一”思想的国度中生活和工作，这些学者们刻苦努力，取得了重要成就：一方面有包含生物人类学、博物馆学在内的人类学院系在英国这个重社会人类学的国度中建成，另一方面则有“本体论人类学”（ontological anthropology）的流行。

洋人学界好标新立异，这有时让人受益，有时却并不如此，尤其是这些有关自然—人文“双系”人类学、“本体论人类学”的叙述，样样都让我想起数十年前人类学的情状。华西坝上的人类学家在学术机构和田野地点之间的活动，便构成这类情状的样本。

在1930年代末之前，华西坝上那些被我们今天称作“人类学家”的学者，即使不是出身博物学，也是在大学里频繁与博物学家打交道。在所谓“田野”里，他们中的民族学家们，不只是一要观察“土著人”的生活、习俗，探知他们的观念；面对围绕人文世界的大山大川，他们还自觉或不自觉地考察“田野”周边的万物万灵。作为传教士学者，他们不可能没有带着基督教现代主义的自然与人文观点来看待华西的草木与风俗。不过，其求索，却早已有了不同于自然—文化二元对立主义的“本体论人类学”因素。可以认为，他们早已在赋予博物学和人类学某种优越的“模糊性格”。

当时的饭桌聊天间，我多次跟如东谈及这个印象。

对学科史有浓厚兴趣的如东，欣然接受了研究华西坝上人类学的这一“模糊性格”的任务，从硕士研究生阶段，他便开始了相关工作。他整理了关于1920~1937年华西协合大学传教士学者博物学活动的文献，选择以植物研究为焦点，追溯华西人类学与其之间的密切关系，借此考察一个历史时期人文科学中的博物学因素及其蜕变。



无论是博物学还是民族学（人类学），无疑都是近代西方知识帝国雄心的内在组成部分。然而，反复揭示这些学派与西式“帝统”之间的话语纠葛，易于使我们忽视这些学科的内在理路和“微观社会学纹理”。为了避免批判的负面效应，如东将注意力集中在知识观念与其他各种社会要素之间的关系上，着重分析观念生成和传播的社会语境。在其论著中，他指出，传教士在华西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是其博物学活动得以展开的情境，故而，若说当年这些博物学活动有什么“路线图”，那么，这些“路线图”之格局，便与传教士社会活动网络大致叠合。另外，当年从事植物研究的传教士学者，始终与华西的人文—自然世界保持着频繁互动，这使这个阶段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形成难解难分的关系。在各种关系互动中展开的华西协合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凸显出了其以博物学为底色的特征。

本书是如东基于其硕士论文修订而来的。

书分五章，在导论之后（第二章），如东呈现了作为区域的华西之自然—人文地理特征、区域权力网络特征（尤其是绅士、军阀、袍哥、传教士并存互动的面貌），及在这个大背景下出现的教会大学和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概貌。在第三章，如东把焦点放在植物研究的知识社会学分析上，考察了基督教宇宙观下传教士博物学活动的展开、其与传教网络的关系，以及当时留下的有关植物采集之旅的遭遇与见闻的记录。在该章中，如东还考察了华西坝上植物学家对植物分类、“本土知识”、植物功用、作物引进与培植、园艺等方面的研究与讨论；进而，他又集中考察了这些研究的人文科学倾向，尤其是其对于自然与宗教、自然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论述。在第四章中，如东在知识与不同思想传统、政治势力、“身份政治”之间的动态关系中，考察了华西传教士植物研究慢慢让位于“民族主义植物学”的历程，尤其揭示了在这个阶段中，传教士植物学在遭遇边疆研究“中央化”的过程中式微的结局。

本书核心部分，带有学术史的浓厚特征。然而，书的导论和结



论，却赋予了这部学术史人类学意涵。在导论中，如东梳理了有关人文视野的自然视野基础的论述；在结论中，他则对华西人类学的博物学底色进行了阐释。

1930年代悄然发生着人类学的现代科学化之转变，对于这场转变，如东也特别重视。在第四章中，如东已概述了这场转变的因由与途径。为了对之加以进一步说明，他在附论中收录其所作《华西的社会学与人类学（1942~1945年）——以〈学思〉杂志为例》一文。该文是基于《学思》杂志的个案研究，分析了抗战期间汇聚于华西坝上的中国学者之学术研究。该文指出，此时，这些研究重在考察边疆和社会问题，在“抗日救亡”的时局下，形成了以“中国史”为主线的学术叙述风格。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那种以相对散漫的方式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植物学和民族学，让位于社会科学化的“社会学”。

近些年，因缘际会，如东转入中国西北与内亚民族研究。在这个专业方向转换的过程中，如东须暂时放下其在学术史、历史人类学、“自然”人类学诸领域的研究工作。几个月前，如东来京，告知他已修订完成了这本有关华西协合大学植物学与人类学之关系的研究著作，这让我喜出望外。

我相信，这部著作对于那些在西南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者有参考价值。直接而言，它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该区域人类学研究的学术史，有助于我们在实地考察和文献研究工作中捡起被不慎扔进“历史垃圾箱”的宝贝，借之还原西南生活世界的自然—人文双重属性；间接而言，它也有助于我们以一个更为冷峻的态度，观察学科转变的时局与问题，更为切实地“在田野中”领悟人文世界的“模糊性格”。

我认为，这点对于如东新开展的“西北民族研究”也一样重要。

王铭铭

2018年7月23日写于五道口寓所

前 言

华西协合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是 20 世纪初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国的教会组织在成都华西坝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该大学 1904 年筹办，1910 年正式上课，是原教育部直属高校华西医科大学和今四川大学医学中心的前身。民国时期，该校传教士兼教师在华西地区曾进行过较为广泛的博物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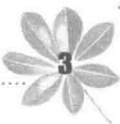
本著以 1920~1937 年华西协合大学的部分传教士在华西展开的植物（博物）研究为主要考察对象，旨在探析华西人类学的博物学基础。全书内容由正文和附论两部分组成。正文主要探讨 1920~1937 年传教士的博物活动和华西人类学研究之间的关系。题目中“地方知识”、“自然阶序”、“植物研究”和“人类学”几个词的这种略显“不合逻辑”的非对称性错置，意在突出传教士植物研究与人类学研究中自然与人文、“正规知识”与“非正规知识”彼此交织的状态；而“华西”则既指涉传教士供职的“华西协合大学”，也指涉其展开研究的中国西部地区。附论则以 1937 年日本侵华之后东部高校内迁成都华西坝之后形成的学术群体在 1942~1945 年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为主要考察对象，探讨其时华西坝学术活动与时局之间的关联。通过对前述两个不同群体智识活动的考察，笔者试图讨论与中国人类学早期研究阶段相关的问题。

中国人类学被认为是“舶来之学”，它的发轫与“西学东渐”有关，但其发展则同时受到东西方社会、文化与学术互动以及“本土语境”的影响。无论是民国时期中国人类学前辈的“本土化”努力，还是20世纪80年代学科重建以来学界对西方人类学理论的重新引介，中国人类学都在“本土”与“域外”的社会和学术互动中展开其生命历程。这也说明，也许并不存在一种绝对意义上的“舶来之学”，正如不存在完全不受外界影响的“本土之学”一般。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著尝试围绕民国时期在华传教士所从事的植物（博物）研究与人类学讨论的“地方遭遇”展开论述，以此检视华西人类学的早期样貌。

常见的学术史研究路数，多围绕某一学术思想、研究机构或研究者（群体）为中心展开讨论，在此基础上呈现学术观念、学科或学派发展的历史过程。本著也难逃此窠臼。本著聚焦的研究机构是民国时期华西协合大学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研究群体则是该机构的传教士，核心则是其植物（博物）研究与人类学实践。笔者采取知识社会学的路径，着重考察传教士博物知识的观念与其他各种社会要素之间关系，以及该观念的来龙去脉。

在将其时传教士的植物（博物）研究置于其所处社会思想语境中考量后，本著发现，在“地方遭遇”过程中，华西传教士植物（博物）研究的“知识兴趣”既受其母国之知识语境的影响，也和华西的自然与人文世界密切关联。这使其研究最终呈现出了不同于母国知识群体的风格。与此同时，这种研究风格也反过来影响了民国时期国人在华西的植物研究和人类学研究。传教士与国人华西研究之间的相互影响虽然也有“知识竞争”的意味，但共享着相同的学术场景。不同的是，前者的智识活动更多服务于“帝国”知识图景的建构，而后者则旨在建立“民族—国家”社会科学知识门类。

最终，在传教士与国人有关华西植物（博物）和人类学研究智识活动的更迭过程中，华西人类学在一定时期内（1937~1950年）形成



了一种内含博物风格的社会科学知识门类。这种人类学研究风格的形成过程，对于我们思考中国人类学早期的学术传统以及“学派”问题有启发意义。

需提前指出的是，本著中部分传教士与博物学家的英文名字为缩写，其全名虽多方查找，仍未查获。部分传教士考察地采取韦氏拼音（Wade-Giles Romanization）标注，转译后仍然不能对应到今天之地名，故采取了音译。今后若有机会重新修订拙著，将努力消除上述缺憾。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主要问题	1
第二节 西人在华（西）植物研究的相关论述	9
第三节 人类学史视野中的博物研究	15
第四节 文献说明与章节概要	19
第二章 传教士植物研究的区域及其依托机构概述	22
第一节 华西概况	23
第二节 教会大学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	36
第三章 华西的植物研究	57
第一节 传教士的博物研究：“宇宙观”与智识行动	57
第二节 植物采集之旅：遭遇与见闻	73
第三节 植物研究：分类、功用、引种与园艺	99
第四节 植物研究的人文之眼：自然、宗教与文明	120

第四章 华西传教士植物研究的转向·····	139
第一节 知识与思想的社会互动·····	140
第二节 遭遇“非基督教运动”的教研机构·····	148
第五章 博物研究与华西人类学·····	166
附 论 华西的社会学与人类学（1942~1945年）	
——以《学思》杂志为例·····	179
第一节 高校西迁与一个教育和学术中心的形成·····	180
第二节 《学思》其刊及其所载社会学和人类学文章浅析·····	190
第三节 余论·····	209
后 记·····	212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主要问题

人类学史乃人类学研究诸范畴之一,“按照写作主题来区分,目前人类学史研究至少有三种主要方式,分别是关注人类学学科史的历史研究、关注人类学学术思想和关注人类学家的历史研究,分别针对研究者、研究机构和学术思想展开讨论”。^①同样,中国人类学史的研究亦是中国人类学研究之一部分,其不仅历时持久,且成果丰硕。若以“后见之明”的优势回视百年中国人类学史,则不难发现,关于中国人类学学术史的研究著述很大一部分集中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显然,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中国人类学史研究与中国人类学学科重建有关,^②但在这场尚在继续的中国人类学史

① 杨清媚:《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第 17 页。

② 不过,亦有学者认为中国人类学史实际上并非一个中断的发展过程,相反,其所经的全盘接受西学、苏联模式、毛泽东思想改造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的重新接续西方人类学理论这四阶段乃是一个典型的人类学学科发展模式。见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夫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胡鸿保、周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研究浪潮之中，也同时存续着一些争论，其中不少问题尚有探讨空间。这些争论与问题包括“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学科地位与关系”“早期中国人类学学派问题”“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等，^①此不赘举。其中，“早期中国人类学是否已形成自己的学派”（以下简称“学派问题”）是在学术层面展开论争较多的问题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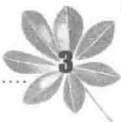
早在1949年以前，我国人类学界便流传着“北吴南杨”的说法，意为北方有以吴文藻为首的运用英国功能学派理论的燕京大学人类学，南方有以杨成志为中心的注重美国历史学派研究方法的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人类学部。^②1972年，李亦园在梳理中国早期人类学史时较为明确地提出南北派人类学之说，他认为“在1930年前后，我国人类学可分成两个派别：一个是以北方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代表，一个是以南方的中央研究院为代表。这两个派别有一个基本上的很大差别，就是燕京大学的人类学，是比较偏向于一般社会科学这一面，而中央研究院的人类学是比较偏向于人文学的，这是一个历史的传统”，而中国台湾的人类学“完全是以南方中央研究院为中心而发展出来的人类学”。^③1988年，张海洋也写专文论述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南北特色形成及发展南北特色的意义，他认为南北人类学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即“解放前的萌发阶段，1952年至60年代中期的分化阶段和1980年以来的强化阶段”。^④张海洋对中国人类学的南北派划分偏向于地域因素。此种划分在黄淑娉和龚佩华的一本人类学通

① 详见王建民、汤芸主编《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胡鸿保《略谈中国人类学重建以来的学科史研究》，《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② 容观复：《中山大学人类学教学和研究述略》，《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第27页。

③ 李亦园：《人类学与现代社会》（增订版），台北：水牛图书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5，第298页。

④ 张海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的南北特色》，载和龔、张山主编《中国民族历史与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第209页。



论性的著作中也有明确表述。^①王建民在其《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中也认为,1949年以前的中国人类学多由南北派所主导;80年代学科重建之后,中国早期人类学的地域特点得到恢复和延续,“很快就形成了新的南北特色”。^②对中国人类学的南北派划分进行讨论的类似论述还有不少,笔者此处摘引者皆为讨论较为集中之文献。这些论述的著者都偏向(或明确提出)以南北派之框架来认识中国早期人类学史的样态,这说明“南派”与“北派”人类学的划分被很多人类学从业者所接受。受此影响,早期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调查与研究也多被归置在“南派”与“北派”的范畴之下展开讨论或再认识。

然而,关于早期中国人类学史“学派问题”的讨论并非没有其他观点。1983年,江应樑先生在回溯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时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人人类学研究中心和代表人物可以做如下归纳。

(1) 北方以中央研究院、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辅仁大学为中心,研究人员有蔡元培、凌纯声、林惠祥、芮逸夫、刘咸、李济、商承祖、颜复礼、董作宾、李方桂、吴文藻、闻宥、费孝通、吴泽霖、林耀华、李安宅、李有义、杨堃、陶云逵、田汝康等。

(2) 东南以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为中心,研究人员有孙本文、吴定良、卫惠林、马长寿、丁骥、陈国钧等。

(3) 南方以中山大学、岭南大学为中心,研究人员有杨成志、黄文山、陈序经、伍锐麟、罗香林、江应樑、岑家梧、王兴瑞、罗致平、梁钊韬等。

① 见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第420~422页。

②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第166页。



（4）西南以四川大学、华西大学、云南大学为中心，研究人员有徐益棠、李安全^①、方壮猷、胡鉴民、蒋旨昂、杨汉先、胡庆钧等。^②

江应樑先生是1949年前中国人类学从业者之一，他的追述看似笼统，实则有其亲历者之经验为据。1988年，龙平平在探析1949年之前中国人类学的学术史时则认为中国当时大致存在三个人类学理论流派，即“借用民族学方法重建中华民族文化历史的学术思想”，“将进化论和历史学派以及中国的考据学派揉合在一起”的历史学派（以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为主）；^③以黄文山、孙本文等人为主的“综采欧美民族学各派之专长，创建中国民族学体制”的文化学派；^④以吴文藻为首的“以国外某一学派的观点和方法为借鉴，探索民族学中国化道路”的功能学派。^⑤1994年，曾昭璇在为梁钊韬先生的《梁钊韬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文集》^⑥作序时，基于晚清中国文化中心南移这一历史脉络提出了“岭南学派”的说法，并认为梁先生的成就得益于“以长期的田野考察、博览群书、创立新说为三大优点”的“岭南学派”

① 原文如此，笔者几番查阅，不见“李安全”这一人物，疑为“李安宅”，此处或为输入或排版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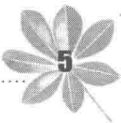
② 江应樑：《人类学的起源及其在我国的发展》，载《江应樑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第478页，原载《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③ 龙平平：《旧中国民族学的理论流派》，载和龔、张山主编《中国民族历史与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第192页。

④ 据龙平平的研究，此派学者“认为中国的民族学应该是一个综合研究的学科。而且应该研究中华民族……但是，他们普遍的毛病是理论与实际相脱节或者只有空洞的理论，或者只要应用的技术。结果不是理论成了无源之水，就是应用陷入盲目迷惘，他们的一切设想成为一阵空谈，最后变成了幻想”。见龙平平《旧中国民族学的理论流派》，载和龔、张山主编《中国民族历史与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第201~202页。

⑤ 龙平平：《旧中国民族学的理论流派》，载和龔、张山主编《中国民族历史与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202~207页。

⑥ 梁钊韬：《梁钊韬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



学风的影响。^①李绍明先生反思了此论说。李先生认为：“岭南学派”的学术传统与“南派”颇多关联，“以中山大学以及厦门大学为代表的岭南人类学历史悠久、学风务实、人才辈出、贡献良多，且特色突出，其是否可从南派中单独析出另为一派，乃是我们研究中国人类学史的同仁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②

不难看出，虽然存在不同看法，但上述关于中国人类学“学派问题”的讨论背后均有一个基本判断，即“中国人类学乃舶来之学”（以下简称“舶来说”）。有意思的是，尽管治中国人类学史者对“学派问题”颇多抵牾，对“舶来说”却鲜有龃龉。^③2001年，郝瑞（Stevan Harrell）回顾中国人类学“史前史”时也认为，虽然中国有着较为悠久的民族志传统，但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人类学这门学科在中国仍然是空白。^④李绍明先生对郝瑞的这一论说持有异议，认为郝瑞的看法虽有其合理之处，但忽略了外籍学者在华的人类学贡献。李先生认为，虽然“那时中国的学人还不占主导地位，但毕竟有许多外籍学者在此推动这一事业，且这一事业也有一些中国人参与并受到锻炼，这不能不把它看成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一个部分或一个阶段”。^⑤李绍明

① 曾昭璇：《代序：哲人已逝 业绩长留》，载《梁钊韬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第4页。

② 李绍明：《略论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第44页。

③ 1932年，杨堃先生在概述中国社会学的基本情况时认为其时中国影响较大的社会学派有“美国文化学派”、“马克思主义派”以及“法国社会学派”，尽管杨堃先生的旨意可能是向其时的学界介绍“法国社会学派”，但他也认为，“以上所说（各派），全是外国的社会学派，不是中国的社会学派”。见杨堃《中国现代社会学之派别及趋势》，载杨堃《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原载《鞭策周刊》1932年第1卷第4期。

④ Stevan Harrell, “The Anthropology of Reform and the Reform of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ical Narratives of Recovery and Progress in China”,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30 (2001), p.140. 亦可见〔美〕郝瑞《中国人类学叙事的复苏与进步》，范可译，郝瑞校，《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7期，第75页。

⑤ 李绍明：《略论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第47页。